



中国古代文化史论

ZHONGGUOGUDAIWENHUASHILUN

王健 著

齊魯書社



中国古代文化史论

ZHONGGUOGUDAIWENHUASHILUN

王健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化史论/王健著. — 济南:齐鲁书社, 2010. 1
ISBN 978-7-5333-2157-4

I . 中… II . 王… III . 文化史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 K2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3590 号

中国古代文化史论

王 健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157-4
定 价	2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中国文化研究的历程与意义

- 一、从当代的中国文化热谈起 1
- 二、文化研究历程概述 6
- 三、研习传统文化的使命和意义 19

第二章 传统文化的创发

- 一、文化的地理基础及其影响 28
- 二、中国文化寻根：从人的起源到远古文化的突破 41
- 三、三代文化开创的基本模式 57

第三章 传统文化的演进

- 一、传统文化的定型期 91
- 二、传统文化的发展期 104
- 三、传统文化的衰变期 109
- 四、传统文化的转型期 113

第四章 食货之路的嬗变

- 一、历史上物质文化的发达时代 116
- 二、传统经济的自我嬗变 149
- 三、传统经济道路的再认识 158

第五章 制度文化的历史功过

- 一、中西古代制度的差异探源 165
- 二、传统皇帝制度的专制特征 169

三、传统制度中的民主因素	174
四、传统考铨、监察制度精华举隅	182
五、传统政治制度与文明关系面面观	190
第六章 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	
一、从巫史文化到人本思潮	203
二、心力构筑的堂奥	209
三、传统思想与世界文明	233
四、传统思想与文明面面观	244
第七章 民族精神的伟大奠基	
一、与时俱进的风貌——传统变化精神	256
二、兼容并蓄的胸襟——传统开放精神	258
三、激扬的民魂——传统爱国精神	260
四、本体的感召——传统道德精神	263
五、韧性的追求——传统进取精神	265
六、玉帛的抉择——传统和平精神	267
第八章 文化的超越之路	
一、沧桑正道——回溯的启示	271
二、含英咀华——继承的思考	278
三、重谱华章——超越的探求	287
四、东方朝阳——中华文化展望	290
主要参考文献	
一、基本古籍	295
二、学述论著	299

第一章 导 论

——中国文化研究的历程与意义

一、从当代的中国文化热谈起

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人类历史已迈入了 21 世纪。在日益走向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上升为社会使用频度极高的关键词,已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象征,因而被当代世界所共同关注。经历了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盛世初现,国运中兴,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影响世界,引领国际文化潮流。当此之时,回首中国文明走过的五千年漫长岁月,重温 20 世纪以来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研究历程,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价值,开辟中华文化复兴的新纪元,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浪潮的强劲推动,学术界自发涌起一个文化问题的讨论热潮,很快席卷全国并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这场文化热几经起伏,历久不衰,给学术理论界和中国社会带来强烈的震撼和冲击。二十多年来,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数以万计的专题论文,出版社印行了数千种专著、译著和数百种丛书,各地召开了主题繁多的文化研讨会,高等学校中成立了各种形式的研究机构,至于广布社会不同层面的历史文化研究会更是不胜枚举。跨世纪的中国文化热,无疑给当代学术史

留下不同凡响的篇章。

回首 80 年代以来的文化热,其兴奋点在哪里? 当年文化大讨论的范围,涉及文化学理论、传统文化起源、中西文化比较、近现代文化转型和文化现代化诸问题,但万众瞩目的焦点则是对传统文化的取舍问题。围绕这个问题,那个时期的前沿学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出现前所未有的理论纠葛,一时派别林立、观点蜂起,既莫衷一是尖锐对立,又相反相成蔚为大观。二十余年来的文化热,大体上以 1989 年为界限,可以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期以批判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居主流地位,后期以弘扬继承传统为主旨的文化保守主义为主旋律。在第一个十年的热潮中,文化研究又超出了纯学术藩篱,而掺杂了强烈的政治和社会诉求,各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在学术对话和后期政治风波中遭际了不同的命运,上演了一幕幕起伏跌宕的文化活剧。

在 90 年代之后,弘扬振兴传统文化的倾向,成为文化传播和研究的学术主潮。其主要表现为研究热、出版热、媒体热、教育热、汉语热和文化战略热点。

首先为研究热。除了前面所述盛况外,国内各种报刊和各种学术期刊的版面上,纷纷开设文化研究专题和专栏,许多颇有成就的人文学科学者将主攻方向转向文化研究,国学研究引起学术界关注,国学也成为时代显学。二十多年的文化热,也造就了一批活跃在研究、传播前沿的文化学者和精英人物。

其二,出版热。中国文化经典的出版成为热点,出版部门推出各种传统文化经典的大型丛书,如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规模达 79337 卷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新近编辑的收有 5200 种书的《续四库全书》^①,华夏出版社出版的 5400 卷、7000 余万字的道教经典总集《中华道藏》。^②1992 年启动的《中华大典》,选录了上自秦汉下迄辛亥革命期间的代表性典籍 3 万余部,约 8 亿字,目前已出版 1 亿

多字。^③北大近年发起编辑的近亿字《儒藏》工程,为此成立了以汤一介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经过广泛征求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编纂方案。^④此外,面向大众的经典注释和白话翻译之作,如篇幅达5000万字的《二十四史全译》工程^⑤,柏杨著的《白话资治通鉴》、从台湾引进《白话十三经》等,风行于各地书市。《论语》、《孟子》等经典著作成为各类书城的畅销书,各种诠释经典的图书乘势占领了市场,受到社会上各种年龄段、各种职业和不同学历背景读者群的广泛欢迎。

其三,媒体热。国内传媒对文化热的推动,主要体现在大型文化节目中。例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的《中国传统文化对话》系列专题节目、中央电视台与北大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合拍的《中华文明之光》系列电视节目等,取得了可观的收视率。特别是近年来央视推出的《百家讲坛》,借助电视平台,架起了专家、学者通向大众的文化桥梁。讲坛将传统文化传遍了中华大地,也捧红了一批热心传播传统文化的大众学者。精深的诸子百家和传统文化,在这里被转化为一种直白、贴切的当代文化。出版界人士认为,“这表明传统文化的根是深植在人们心中的,只要用合适的方式表达,就会得到广泛的认同”。^⑥在地方上,各省市的大众传媒也纷纷开设“国学讲坛”等公众文化平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国内新一轮文化传播热潮。

其四,教育热。文化热兴起以来,推动了教育领域文化知识体系的传授。近年来国家进行中学新教材、新体系改革,在各类语文、历史教材中,进一步扩充了有关中外历史文化内容的含量。

为了使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后继有人,教育界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经典的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大陆吸取了台湾地区“读经教育”的经验,学前教育 and 小学教育领域出现了持续升温的“读经热”。全国已有百万以上的孩子加入了读经的行列。北京市2001

年人民代表大会提案之一就是“大力推进经典诵读工程”。

在高等教育领域,一些高校开始设立培养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的硕士点、博士点。鉴于青年学子普遍缺乏国学根底,国学有几成绝学之忧,一些大学采取变通方式来培养国学人才。1992年,北京大学在原来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基础上,正式建立国学院。1993年,曲阜师范大学成立孔子文化学院。1994年,北京大学独辟蹊径开设文科综合试验班。2003年武汉大学设立国学班,^⑦2004年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⑧这些机构,招收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青年学子,培养国学人才。同时,积极从事传统文化传播和研究,推动了传统文化的普及热潮。

其五,汉语热。几年持续攀升的“汉语热”,其标志性现象就是中国的孔子学院走向全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适时开展对外汉语教学,随着留学生大量来华,对外汉语工作逐步得到重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很多对中国感兴趣的國家向中方提出办学的邀请。中国借鉴德国建立歌德学院、西班牙建立塞万提斯学院的经验,以2500年前的智者孔子的名字命名汉语推广机构。目前,“孔子学院”由中外教学机构合办。截止到2008年10月,已在全球设立了292所孔子学院,与中国合作举办“孔子学院”的申请仍然源源不断。

令人振奋的是,据统计,平均每三天半就有一所“孔子学院”在海外诞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透露,中国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没有一所孔子学院是我们主动找人家想建立孔子学院,而是各国的教育部长、教育官员或者是驻华大使在国家汉语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等排队待批,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⑨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许琳说:“海外通过汉语学习中国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需求十分迫切。孔子学院已成

为体现中国软实力的代名词。”不少院校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开始通过友好城市的渠道积极参与海外“孔子学院”建设,签订语言教学交流协议。“孔子学院”成为当代中国“走出去”的符号。根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的规划,到2010年要在全球建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⑩

其六,文化战略热。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新时代文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了文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只有繁荣的经济而没有昌盛的文化,只有物质的丰富而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称不上“全面小康”。国家领导人认识到,文化建设事关国际形象,文化的力量“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渗透,世界之争不仅是经济、科技、国防实力之争,也是文化实力和民族精神之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不仅带来货物、服务、资本、人员等在各各国间的频繁流动,更带来了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在世界范围的交流比较。用高层官员的话说,“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自己的文化优势,就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就会处于被动守势”^⑪。

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中国的文化形象和在全球的文化地位,必将提出迫切的要求。2003年8月,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的课题,就是文化问题。胡锦涛强调,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更加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⑫。

以上所举例证,足以勾划出当今学术界和全社会开展传统文

化研究和普及的热烈氛围。二十多年的推动和进展,带来一个大文化观的外延和扩张,衍生出产业文化、电视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乃至校园文化、家庭文化等等概念群,其使用频度之高,目前只有“改革”一词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毋庸讳言,传统文化热的潮流也带来一些流弊。近年来,学术界和舆论界对文化建设的庸俗化现象多有批评,将其归纳为三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争名人故里,将文化资源开发完全商业化,利用当地先贤、历史名人赚钱牟利,比如大兴土木重建名人故居,甚至连有很多争议的负面历史人物的旧居故地也大肆修建。地方之间为了争一个名人的故乡籍贯,引经据典争吵不休。二是搞公祭,各地凡是能挖出来祭奠的先人都祭个遍。三是所谓的“文化大项目”。尽管面对各种质疑的声音,但一些地方仍在以急功近利的态度在书写着文化建设的“大手笔”、大工程。人们不禁质疑,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文化政绩,还是民生?^⑬据统计,每年各地各类文化节多达千余种,这些活动当中,的确有些是在借“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名义,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政绩。凡此皆属于弘扬传统文化大潮中的末流之弊。

以上粗略考察,足以说明传统文化及其研究在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不应该隔膜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热潮;关注、理解进而投身于传统文化研究和传承的实践中,既是莘莘学子责无旁贷的学术责任,也是时代赋予新世纪学子的历史使命。

二、文化研究历程概述

(一) 民国时期的传统文化研究

追溯起来,早在汉代班固著《汉书》时,就创立了《艺文志》体

例,为先秦到汉代的文化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记录。到宋代郑樵写《通志》,专门创设《二十略》栏目,可见古代学人已开文化史研究的先河。

近代以来,以文化史编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研究,起步于国学大师梁启超。他首倡撰写文化史,并拟定了中国文化史目录,可惜未能成书。“五四”文化运动开启了20世纪文化研究的黄金时代,众多的思想家和启蒙学者感应时代脉搏,奋起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空前深入的总结和批判,文化史研究渐受关注,涌现出一批对中国文化具有卓越造诣的学术大师,如王国维对殷周制度、宋元戏曲史和甲骨学的研究,梁启超对诸子学和清代学术的研究,郭沫若对金文、诸子学和古文化的研究,陈寅恪对隋唐文化和晚明文化的研究,陈垣对蒙元文化和传统宗教的研究,冯友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等,取得了辉煌成就。

这一时期,研究中国文化通史性专著,有杨东莼《本国文化史大纲》、顾康伯《中国文化史》、柳诒征《中国文化史》、陈登原《中国文化史》、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等。对断代或某一历史时段文化的研究占有醒目位置,如孟士杰《先秦文化史》、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朱谦之的《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等。区域文化史和专题文化研究也有重要成绩,如夏光南《云南文化史》、张立志《山东文化史研究》等。在专题史方面,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云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其内容包括经学史、理学史、婚姻史、绘画史、图书史、金石史等,囊括中国文化史的大部分,多达50种。

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具有一些重要特点。首先,对旧史学“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缺陷的共识,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动力。其次,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是这一时期尤其是30~40年代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文化史的现实目的。其三,这一

时期的文化史研究虽然深受西方文化史观的影响,但已开始尝试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诠释文化现象。尤为难得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研究,开始突破中国文化本位主义,尝试在世界文化的视野中把握中国文化的流变。其四,民国时期的学者对于文化史研究的方法亦特别留意探讨。总之,这一时期的成果,虽然在文化范畴的理解和使用上还不很统一,著述亦欠成熟,但为中国文化史研究开拓出园地,打下重要基础。^④

(二) 80 年代文化研究的兴起

建国以后,文化和文化史学科研究被中断,这片刚刚开垦出来的处女地重新又荒芜起来,沉寂了三十多年。在这期间,没有一部以中国文化命名的出版物,教科书、专门刊物亦付阙如。大学的中国通史课中有所谓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块,其实文化属于陪衬乃至点缀,几乎略而不讲。虽然它的相关学科如考古、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学术史和艺术史等,都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这都是分散的具体的专题研究,缺乏从整体上对中国文化作综合研究。

中断原因何在? 建国后近三十年间文化史研究的萧条,原因是复杂的。重大的误区出现在对人类文明史的理解上。由于在“极左”年代,曾将历史唯物主义片面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对一些文化史著述,简单地以资产阶级文化史观倾向而加以否定。在教条主义者看来,中国数千年古代文化不过是封建文化的同义词,学术界的任务就是努力批判其负面价值而已。这种片面的极端认识,导致取消广义的文化研究,狭义文化史则被分解到思想史、哲学史等学科中。

然而,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科学却方兴未艾,作为当代人文的交叉学科表现出极大的学科优势。20 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学研究持续繁荣,大师辈出,学派林立,理论体系日趋成熟。涌现出的著名

学派群体,有早期进化学派、传播论学派、法国的社会学派、美国的历史学派、西方的功能主义学派、文化心理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著名的文化学大师,分别有德国的韦伯、斯宾格勒和雅斯贝斯,英国的汤因比,法国的斯图尔德、美国的怀特、亨廷顿等,对文化学科形成和发展均作出重要的建树。^⑮

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这一命题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引发了激烈争论,但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二战之后,全球掀起非殖民化浪潮,许多国家内部出现要求保持民族文化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冷战结束以后,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演变为多种文化、宗教和多个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多极对立,文化正成为世界的中心问题。

全球学者对文化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二十多年来,世界性的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哲学与文化、文化与人类文明作为会议主题,如1984年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宣布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心已经转向文化哲学。1993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9届世界哲学大会,其主题是“世纪转变中的文化价值和人类”。文化问题引起国际组织和社会的重视,1982年墨西哥召开第2届世界文化政策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随后起草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计划。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启动了探究“普遍伦理”的研究项目,于1997年建立了“普遍伦理计划”,并于同年在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的那波里,1998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国际会议,共同探讨建构全球性的“普遍伦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恢复传统文化研究,1982年上海召开了两次中国文化史研究会议。学者们痛切地感到,这个学科在建国之后成为学术领域巨大空白点,需要尽快填补。可见,大陆地区文化

研究的复苏,明显受到世界学术潮流的影响和推动,这种学术上的补课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除了学术动因外,文化研究的兴起有着更深刻的时代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启动,人们期待“文化思想的解放为之开路,成为雷鸣之前的闪电”。改革开放的推动,使文化研究成为继真理讨论之后思想解放的又一个突破口,它是从思想文化上对十年文化浩劫的彻底否定。如学者们所反思的那样,“文革的劫难,震撼了国人”,十年浩劫的实质,是封建主义披着社会主义装饰登场的顽强表现,它借文化之名,行反文化和毁灭文化之实。“文革”期间泛起的封建忠君思想、宗法社会的血统论和人身依附关系、践踏民主和法制的封建人治传统、扼杀个性的群体至上观念、搞穷过渡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封闭狭隘的排外主义等便是明证。如不能彻底破除这些封建传统观念,就不能真正拨乱反正。因此,研究者高度评价了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热,认为这是一场“真理标准讨论的继续”,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华民族“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⑥。回顾80年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战线所取得的最突出进展,就是以文化研究为代表的巨大成就,这已成为学术界大多数人所取得的共识。

1982年,“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召开,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讨论中国文化史研究现状与学科建设的学术会议。会议指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点”,“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⑦

80年代文化热的进展,学者将其归纳为八点表征、三种取向、

十个问题和两大焦点。^⑬八点表征,是指在研究队伍、研究机构、学术沟通、层面形成、理论模式、争鸣气氛、纵向沟通、既得业绩八个方面都出现了文化热。三种取向,是说当时文化研究取向已明显地分化为三:一是关注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企求超越利害的考虑,从传统本身说明传统;二是关注中国文化的价值判断,企求有助于观念的变革,从现实出发反思传统;三是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企求确立稳态的系统,从预测需要规范传统。

十个问题是指文化讨论中提出并可进一步讨论的若干学术问题:即文化的涵盖面、文化的重叠性、中国文化的特征、结构、发展阶段、空间差异、传统的总体估计、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和世界文化的中国化。

两大焦点乃是指当时争鸣的中心问题:一是儒学问题;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从学术命题来看,涉及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主要集中在:

- (1)关于文化与传统文化概念的界定;
- (2)传统文化形成的基本环境和成因;
- (3)传统文化的类型、特征和核心精神;
- (4)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和发展道路、前景问题。

从学术成果看,十年文化研究出版了文化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中国古代文化、中国文化史、地域文化史、专题文化研究著作数百种,其中包括一些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学术著作和普及丛书,例如上海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吉林的《历史反思》丛书、广东的《传统与现代》丛书、北京的《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丛书等。通史性的文化史著作,如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谭家健主编《中国文化史概要》,刘蕙孙著《中国文化史稿》等。断代和专题文化史研究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文化研究的深入,有赖于一批引导潮流的著名学者,如老一代

的冯友兰、张岱年、梁漱溟和季羨林等，纷纷登上文化讨论的学术舞台，这是一批民国时代已有盛誉的中国学术中坚，后来均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大师；同时也造就了如李泽厚、朱维铮、汤一介、冯天瑜、刘泽华等后起的文化学人，其观点影响了 90 年代乃至新世纪的青年学人。

反思 80 年代的文化热，也存在相当程度的偏失。第一个十年的文化反思，文化激进主义态度占据了主导倾向，所带来的问题也引起学术界的检讨和反省。在已时过境迁的今天，我们有可能克服近视的局限和利害的牵制，回头给予冷静、客观和全面的评价。

（三）90 年代以来弘扬论的兴起

进入 90 年代后，整个研究形势为之一变，从批判传统为时尚，转变为几乎是弘扬论的一统天下，其间的原委是值得分析的。

首先，是学术界对于激进主义文化观的反思。急剧变革时代反传统，稳定发展时代尊重传统，这被认为是历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当代文化研究也不例外。第一个十年的文化反思，以激进批判传统文化为主导立场，其结果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泛滥，这种虚无热削弱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优秀文化的传承力，导致功利主义泛滥，舆论导向倾斜。

学者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一些人不但歪曲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而且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对源远流长的灿烂民族文化也一笔抹煞。这样一些荒唐的言论，不但远离历史的真实，对于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也都是十分有害的。”^⑬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屹立五千年，历经磨难，饱尝艰辛，战胜各种惊涛骇浪，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就是因为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